热点聚焦

加快形成推动中部地区崛起的更大合力

■ 陈 宪

> 科技型企业在中部地区崛起中承担着无可替代的基石和主体作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尤其是数字化转型，既是其自身蜕变发展和竞争力得以提升的需要，又将成为新质生产力形成、赋能和聚变的过程。

3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长沙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时隔5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主持召开以“中部地区崛起”为主题的座谈会。

中部地区的发展如今站到了更高起点，但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这次长沙座谈会的重要讲话精神，一以贯之抓好党中央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一系列政策举措的贯彻落实，就必须加快形成推动中部地区崛起的更大合力。

加快形成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互促共进合力

习近平总书记这次座谈会上强调“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还要“更加重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加强重大科技攻关，增强产业创新发展的技术支撑能力”，“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构建上下游紧密合作的创新联合体，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中部地区有着较好的产业基础，在新时代，产业创新发展要有针对性地以科技创新引领，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具体而言，企业自主创新尤其是科技型企业自主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内在源泉。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科技型企业自主的研究开发活动，对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对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都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科技型企业在中部地区崛起中承担着无可替代的基石和主体作用。在企业发展的早期，研发投入主要集中在开发试验研究方面。当企业发展到高研发、高技术阶段，在研发投入中，就必须选择是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投入多一些还是开发试验研究的投入多一些。中部地区的科技型企业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投入，是机会成本最低的选择，有利于企业的中长期发展，并有可能持续引领行业发展，承担和实现更多的社会责任。

加快形成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统筹发展合力

在谈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时，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制造业是中部地区的产业名片，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六省在这方面都有各自的传统优势，传统产业在中部地区制造业中的占比超过80%。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尤其是数字化转型，既是其自身蜕变发展和竞争力得以提升的需要，又将成为新质生产力形成、赋能和聚变的过程。

制造业是中部地区经济的底座。落实这次长沙座谈会精神，要“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制造业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这些都是产业发展从传统产业到新兴产业再到未来产业的逻辑展开。其中，“统筹”是关键，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这三类产业的增长方式不同、发展路径相异，需要通盘考虑、先立后破。

中部地区在统筹发展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过程中，正在形成并将继续强化以下特征性事实：产业规模快速增长。在制造业和先进制造业占比稳步提高的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不断上升，培育未来产业也被提上重要议事日程；产业集群效应逐步显现。例如，长沙的工程机械集群是湖南全省的工程机械和先进轨道交通装备集群领域的代表，中联重科智慧产业城拥有全球领先的“灯塔工厂”和智能产线，实现了高度自动化和智能化生产。

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以科教资源丰富、高新技术企业密集的湖北省为例，在技改提能、制造焕新的引领下，汽车、冶金、化工等传统产业加快其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牢固夯实传统产业逆势上扬基本盘，涌现出了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头部企业。比如，在“中国光谷”，烽火通信打造了武汉首个双5G智慧工厂，实现“用5G制造5G”。

创新和产业生态不断优化。中部地区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出台一系列文件政策以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积极打造优良的营商环境，吸引和培育众多创新创业企业，新注册商事主体数量保持稳定增长，体现了市场对中部地区新兴产业发展的高度认可和积极参与。

加快形成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区域联动合力

“加强与其他重大发展战略的衔接，更好融入和支撑新发展格局”，也是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的一个重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对相关举措进行了细致论述：加强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深度对接，加强与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融合联动。有序承接产业梯度转移，优化产业布局。加强现代化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强化中部地区的大通道格局。建立健全区域内省际合作机制，提升区域协同发展水平。大力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发展，加强都市圈之间协调联动，更好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发展。

其中，要理解“建立健全区域内省际合作机制”“加强都市圈之间协调联动”等重大表述，就要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发展的空间演化逐步表现出了两种基本形态：集聚发展和集群发展，前者指单个城市的发展，后者则是指大城市、中心城市和周边城市共同发展。近十多年来，我国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城市集群发展模式，其发展逻辑是从大城市到中心城市，再到都市圈和城市群。大城市和中心城市是城市集群发展的起点，都市圈是城市集群发展的落地形态，城市群是城市集群发展的平台。我国的省域行政区经济正在向以中心城市为龙头的城市群、都市圈经济转变，都市圈和城市群已经成为新的区域增长极。

我国中部地区城市发展的空间演化不同于东部沿海的一个特征是，从集聚发展到集群发展所经历的时间相对更短。中部城市崛起，包括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发展，在中部地区崛起中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目前，长江中游、中原城市群的发展规划都在“十四五”期间编制了实施方案，长株潭都市圈、武汉都市圈和郑州都市圈的发展规划都已获国家发改委批复。城市集聚和集群联动发展成为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力量。

值得指出的是，中部六省基本都是农业大省，其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大多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农业农村发展、乡村全面振兴在中部地区崛起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城市化、工业化带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要通过诸多举措扎实推进中部地区乡村全面振兴，这些措施的落地落实将更好地实现区域联动的实际效能。

加快形成推动中部地区崛起的创新合力、产业合力和区域合力，将全面发挥其承接东西、纵贯南北的区位优势，使中部地区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全面高质量发展中作出更大的积极贡献。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和深圳行业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学界新著

从学理上讲好『对口支援』的中国故事

■ 张长东

影响一个国家治理体系设计及治理效能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国家的规模。

一方面，国家规模越大则行政层级往往越多，治理难度相应更大。另一方面，国家规模越大，也意味着地域广阔、地理差异大，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往往不平衡——出现“大国发展的非均衡性”难题。《对口支援：大国治理的中国经验》（以下简称《对口支援》）一书的领衔作者周光辉教授，是吉林大学行政学院的资深教授，也是教育部高等学校政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他与合作者王宏伟博士基于前期研究，提出了“超大规模国家面临规模治理和推进发展相互交织”的重大命题。

超大规模国家治理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即“央地关系”）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对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作出进一步要求部署。在超大规模国家的治理中，当代中国展现了良好的治理效能，这被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制度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实践也证明：在超大规模国家的治理中，党的坚强领导和党的人事管理权，也是财政改革成效和国家善治的有效保证。作为2022年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和2023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对口支援》一书进一步关注对全国区域间协调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尤其是强调政府间横向关系中“对口支援”这一破解大国治理中存在的非均衡性难题的“规模治理工具”，为破解“超大规模国家面临规模治理和推进发展相互交织”的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制度和政策方案。

就对口支援的历史发展、具体类型、制度和政策演进等进行梳理之后，《对口支援》重点探讨其思想动员机制、组织管理机制、变迁机制和动力机制等四大机制，分析和讨论了其六大功能：分散风险、分摊成本、汇集资源、形成合力、协调发展和增进团结。结合典型案例展开分析，在案例中展现对口支援的具体运行机制和功能。本书最后还探讨了对口支援制度的深远意义和完善途径等，为进一步改进这一制度提供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做到了理论和案例相结合，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之治——尤其是“双重奇迹”的制度基础，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大国治理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该书也有意识地与政治学的一些重要议题、重要理论展开了对话。“国家规模”近年来成为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关注点，被用来解释很多传统的重大议题并提出了新的视角。书中提出小国治理虽然存在很多优势，但也存在脆弱性等劣势，和大国治理形成了鲜明对比。

该书提出的类型、机制和功能，为进一步的比较个案研究和定量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分析框架和一些具体的命题，为后续研究者提出了一些可供进一步研究的理论问题和实证问题。比如，我们如何评估一个对口支援项目的绩效？哪些制度性因素和文化性因素影响了项目绩效？更进一步，不同的地方政府在不同的对口支援项目中是否存在积极性强弱不同的问题，为什么？在横向比较研究的同时，一些具体的对口支援政策的演变，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纵向和横向府际关系的重要切口：这一政策是如何起源的（议程设置）、如何被执行的、如何调适演变的，在经历了制度改变之后是否能有效提升参与方的积极性和项目的绩效？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主任、教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思想者观察

《政府工作报告》学习解读——

以进促稳 突出创新 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 胡 敏

> 创新不仅体现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层面，在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重点工作上也需要进一步推进观念创新、政策创新、体制创新、实践创新。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我国发展大局和趋势的科学把握中充分认识潜力优势，确立了新一年发展目标。这充分展示了中国发展的光明前景，充分彰显了党和政府带领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坚定信心。

设定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 把握稳中求进以进促稳的工作基调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综合考虑国内外形势和各方面因素，兼顾需要和可能，并考虑就业增收、防范化解风险等需要和经济增长潜力以及支撑条件，也着眼于“十四五”规划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相衔接，将2024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设定为5%左右。

*5%左右的经济增长，合理兼顾质与量。*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从现在开始按照“两步走”战略规划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

按照现有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和汇率，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在5.33%左右；在“十四五”“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长需要保持在5%以上的水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据此强调，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强大生产能力的优势，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因此，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必须有这样一个速度。

*5%左右的经济增长，是可实现的增长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疫情三年我国经济增长平均仍达到4.5%。过去一年，疫情防控平稳转段，国民经济恢复呈现波浪式发展、曲折中前进。去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6万亿元，增长5.2%，增速居世界主要经济体前列，中国经济彰显出强大韧性和活力。经受风雨磨砺，进一步坚实了我国显著的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产业体系完备的供给优势、高素质劳动者众多的人才优势以及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优势。保持5%左右的年增长率，我们就能不断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推动经济持续向好、行稳致远。

*5%左右的经济增长，需要各方齐心协力。*5%左右的经济增长是一个统领性指标，今年我们还要实现新增就业1200万人，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在3%左右，居民收入增长保持与经济增长同步，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等等。实现这一系列宏观经济目标有不少挑战，需要各方面工作的有力支撑。

《政府工作报告》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强调了“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工作原则，政策取向强调“进是方向和动力”，要在推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上积极进取，在财政货币政策上着眼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特别是要谨慎出台收缩性抑制性举措，清理和废止有悖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规定，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确保各方面政策同向发力、形成合力。今年政府工作的十大任务，充分体现“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要求，着力增强经济活力、防范化解风险、改善社会预期。这每一项工作部署都抓住了主要矛盾、针对着瓶颈制约，只要扎实推进切实落实，都将从各个方面支撑起实现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在全社会营造浓厚的创新发展氛围

自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以来，各方面都在不断学习和加深理解，也越来越认识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大力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的实践着力点，是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机遇的关键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全国两会在参加他所在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再次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们必须抢抓机遇，加大创新力度，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

《政府工作报告》在部署全年十大重点工作的前两位任务时着力的就是创新，强调要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支撑。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其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我们要充分发挥创新的主导作用，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促进社会生产力实现新的跃升；坚持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一体统筹推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一体部署实施，深化教育科技人才综合改革，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动力。

当然，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喊口号、拼热度，而是要有科学的规划和部署、正确处理好传统和现代、现状和目标等重大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就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政府工作报告》在部署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方面都作出了详尽科学的安排和引导。

创新不仅体现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层面，在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重点工作上也需要进一步推进观念创新、政策创新、体制创新、实践创新。为此，必须深入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强化系统观念，把握和处理好重大关系，从整体上深入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深化改革开放，促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持续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更大成效。

不断增强民生福祉 坚持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政治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当今中国人民最大的期盼和民意。《政府工作报告》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部署中继续给人民群众带来一系列实实在在、可及可达的幸福“礼包”。比如，要多措并举稳就业促增收，提高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能力，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30元，推动基本医疗保险省级统筹，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提高20元，加强城乡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等等。这些都体现了以发展思维看待补民生短板的问题，又注重从人民群众急难愁盼中找准工作着力点、政策发力点。

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必须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要求政府工作人员遵守法纪、廉洁修身、勤勉尽责，干干净净为人民做事；要求各级政府坚持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勇于打破思维定式和路径依赖，切实做到不折不扣、雷厉风行、求真务实、敢作善为抓落实，确保最终效果符合党中央决策意图，顺应人民期待；广大干部要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

蓝图绘就，贵在实干，中国式现代化愿景可期！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社长】

理论与实践

激发乡村人才振兴的“三个动力”

■ 沈满洪

> 高校作为人才供给部门，在人才的“专”上必须解决适销对路问题，根据社会需求培养人才。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的最后一条即第二十八条突出强调了“壮大乡村人才队伍”，就乡村人才振兴作出了全面部署。落实乡村人才振兴战略既是当前的紧迫任务，更是长远的关键之举。乡村人才振兴需要激发需求拉动力、供给推动力、政策驱动力这三个动力。

激发乡村人才振兴的需求拉动力

乡村人才主要涉及三方面：一是经营管理人才，尤其是创业人才；二是科技创新人才，尤其是适用技术创新人才；三是公共管理人才。

如何激发需求拉动力？第一，打造良好的乡村营商环境，让创新创业人才在乡村有舞台、有岗位、有机会。如通过“标准地”建设发展高效生态农业，通过冷链物流体系建设发展农产品深加工产业，通过文化挖掘、景观开发、民宿升级发展乡村旅游业等。第二，加强乡村科技服务中心建设，让人才在乡村能够产生集群效应。乡村科技服务人才可以在事业编制与市场方式之间自由选择，可以由专职科技人员、科技特派员和柔性引进人才共同构成。第三，对所有服务乡村振兴的科技创新人才提供“岗位特殊津贴”，给予物质激励；每年评选“优秀乡村科技工作者”及“有突出贡献的乡村科技工作者”等，给予精神激励。

激发乡村人才振兴的供给推动力

乡村振兴的人才供给潜力巨大。从乡村内部看，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乡贤回归。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我国呈现出大规模的人口从乡村到城市、从北方到南方、从西部到东部的现象。这些转移人口中不乏创新创业者和有一技之长者，如何适当地吸引他们中的一部分回归家乡再创业，是一个大课题。比如，浙江省2015年发文引导浙商总部回归和资本回归，不仅逐步实现了总部回归、资本回归，而且实现了人才回归和智力回归。桐庐县快递业的乡贤回归家乡，创办了一大批工厂化生产的农业企业、高端酒店企业等，既延长了快递业的产业链，又大大促进了乡村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的集聚。二是技能培训。传统农民如何成为农业企业的工人，又如何成为农业科技人才？“建德师傅”的模式提供了部分答案。浙江省建德市通过对草莓种植者进行规范化科技培训，使他们成为草莓科技的传播者、草莓种植的指导员，把草莓科技撒向全国各地。由此，一方面，实现农民由从事农业转向从事科技服务业；另一方面，带动全国各地草莓种植户实现优质高产，实现增收致富。

从乡村外部看，人才供给主要也是两个方面：一是部分大学生回乡、大学生下乡。哪里能够引进、留住、用好大学生，哪里的乡村必然振兴。高校作为人才供给部门，在人才的“专”上必须解决适销对路问题，根据社会需求培养人才；在人才的“红”上必须解决重心向下问题，鼓励人才到乡村创业。人才成长的基本规律是“下沉越深，上浮越快”。二是科技特派员下乡、科技特派员创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蕴藏着丰富的人力资源，让科技特派员到基层去，把论文写在乡村大地上，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甚至创办学科性公司，既有助于自身成长，又有助于乡村振兴，均具有广阔前景。

如何激发人才供给推动力？第一，对于乡贤回归家乡创业或发展慈善事业贡献突出者颁发“荣誉乡贤”证书，享受类似于“荣誉市民”之类的相关待遇。第二，可推广“建德师傅”经验，将桐庐快递师傅、建德草莓师傅、临安乡村运营师傅等技术和模式推广到全国乃至国外。第三，设立大学生乡村创业基金，对有志于到乡村创业的大学生提供大力资助。第四，进一步完善科技特派员制度，对科技特派员提供应用性研究项目资助，对创办企业的科技特派员提供税收减免政策。

激发乡村人才振兴的政策驱动力

乡村人才振兴既存在供过于求的问题，又存在供不应求的问题，政策驱动是乡村人才振兴的调节变量。

从供给端看，要改革高校学科专业的设置，对于乡村振兴的长线学科专业采取“小而精”策略，避免大规模培养“一个模子倒出来”的无差异人才。从需求端看，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让乡村成为创新创业的热土。在乡村，完全可以发展立体化工厂化的高效生态农业，完全可以发展环境敏感性工业和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完全可以发展农文旅融合的旅游业，人才培养单位都要据此顺应需求的变化大势。

乡村振兴人才供不应求的问题，主要出在供给端：一是即使培养出了适合到乡村创业的大学生也因为导向问题不愿意去，二是缺乏在乡村实践中培养善于整合资源、开发资源、利用资源的乡村运营人才和企业家队伍的谋划和机制。

如何激发政策驱动力？第一，改革学科专业结构，培养更多更好的乡村振兴适用人才。第二，大力推进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如“农业技术+管理”“环境敏感性技术+管理”“农耕文化+管理”等都是乡村急需的。第三，激励有能力服务乡村振兴的人才到乡村去，充分激发人才服务乡村振兴的积极性。实施城乡差异化政策，对于到乡村创新创业的人才提供比城市更加优惠的人才政策。第四，大学与乡村合作创办乡村共富学院，致力于培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乡村运营人才和企业管理人才。

（作者系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农林大学党委原书记）